

## 女性译者的隐身与显形：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翻译实践

王明亮\*, 王乐莹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晚清（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至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该时期翻译成为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叙述多聚焦于男性译者，女性译者则常被忽视或边缘化，而事实上女性译者的译事译作充分体现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复杂性，且多位女翻译家还有待学界的系统研究<sup>[7]</sup>。本文旨在挖掘这一时期被历史“隐身”的女性译者，探讨她们如何通过翻译参与社会思想变革，同时分析其翻译策略与社会性别观念之间的互动，揭示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在语言与文化之间寻找自身表达的空间。该时期的女性译者可能并非进步的女性主义译者，但其女性译者身份赋予了她们理解原文的独特视角，译作中女性主体性的彰显也体现出清末民初女性通过翻译开拓生存空间，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

**【关键词】**翻译实践；女性译者；晚清到五四时期

**【收稿日期】**2025年12月12日

**【出刊日期】**2026年1月7日

**【DOI】**10.12208/j.ssr.20260026

### The invisibility and visibility of women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s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ay Fourth Period

Mingliang Wang\*, Leying W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a experienced a critical period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history. During this time, transl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ranslation have long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male translators, often neglecting or marginalizing their female counterparts. In fac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works of women translators during this period vividly reflect the social and complex nature of translation, but many prominent female translators remain under-researched in academic circles<sup>[7]</sup>. This paper aims to uncover the “invisible” female translators of this period and explore how they engaged with social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ontemporary gender ideologies, revealing how women sought a space for self-express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um, the female translators of this era may not necessarily be considered progressive feminist translators. Nevertheless, their identities as female translators offered them a unique perspective in interpreting source texts. The asser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ir translations reflects their efforts to carve out a space for survival and to construct their own identities through the act of translation during a transformative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Translation; Female translator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 历史语境：民族危机、女学兴起与翻译中的性别缝隙

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日益腐败，中国的国家危机日益加深，如康有为所指出的，犹如“寝于火薪

之……俄北瞰，英西烟，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为国，岌岌哉<sup>[6]</sup>。”在这种国家危机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了空前的怀疑。而清末戊戌变法的失败，更使得男性启蒙知识分子运用手中之笔，掀开了

\*通讯作者：王明亮

向西方学习,以唤醒民众、拯救国家的历史序幕。而任何思想的引进都离不开翻译,他们借助翻译,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试图拿起笔来使文化和文学的改革成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而女性也因裹着小脚和未受教育,而成为衰败中国的隐喻,如何改造与发展女性随即成为当时男性精英分子关注的重要议题,故清末女权话语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推动下经历了从“倡女权”到“求解放”的演变历程,为这一时期女性译者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环境<sup>[9]</sup>。

### 1.1 晚清民初的社会转型与女性觉醒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的深刻转变。这一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传统社会的危机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革之路。维新变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接连爆发,为女性教育与社会参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女学的兴起、留学风潮的扩展,使得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得以接受系统教育,拥有参与翻译与思想传播的能力。

在这一时期,女性教育开始受到重视。1898年,中国第一所公立女校——经正女塾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女性教育的开端。随后,各地纷纷设立女校,女性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学习外语、科学、文学等知识。同时,留学风潮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许多女性前往日本、欧美等地深造,接触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价值,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变革。

### 1.2 女性译者的文化位置与“隐身”机制

早期女性译者在出版物中往往以“某女士”“一女界人”或匿名出现,译作也常被归入丈夫或男性亲属名下,因此能确定的女性译者数量极少。例如日本研究清末翻译文学的资深学者中村忠行曾怀疑近代女翻译家陈鸿璧的性别,认为其像周作人发表译作署名“碧罗女史”一样,是一位男性的“假借”<sup>[10]</sup>。这种“隐身”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压制,也体现出翻译活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不平等也体现出清末民初由男性精英倡女权、兴女学、塑新女性以图强国保种的伦理语境。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冰心、赵萝蕤、吴弱男、薛琪瑛、薛绍徽等,她们向中国读者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涉及语言包括英、法、德、俄、日、意、西班牙等翻译的题材内容多样,体裁更是涉及诗歌、戏剧和小说。而且她们的翻译水平之高,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获得了高级别的奖励。冰心因为翻译了纪伯伦的《先知》而被黎巴嫩

授予国家级勋章,赵萝蕤因为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而被授予“彩虹翻译奖”和“中美文化交流奖”。

20世纪初,女性译者数量增加,郭延礼在《女性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翻译成就》中提到:“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就目前所能确定的人数不算多,只有20人;但她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文学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学现象<sup>[2]</sup>。”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其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受到严重限制。女性译者的作品常常被忽视或归功于男性,这种现象在翻译活动中尤为突出。例如,林纾的翻译作品中,许多实际上是由女性口述者协助完成的,但这些女性译者的贡献却鲜有署名。这种“隐身”机制不仅是对女性译者劳动的忽视,更是对女性知识分子身份的否定。

## 2 “被忽视”的女性译者及其译介实践

### 2.1 薛绍徽: 科幻翻译的性别协商

晚清才女薛绍徽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位女性翻译家<sup>[3]</sup>”,她与丈夫陈寿彭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是第一位翻译西方科幻小说的译者。但小说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述,所以她翻译是在丈夫的口述下进行的,并没有真正进行独立翻译。因此,薛绍徽在翻译方式上仍属于“林译式”,但小说的翻译水平相当不错,译本忠实于原著<sup>[3]</sup>。

从译作《八十日环游记》中,就能看出薛绍徽的翻译既忠实又创造。既忠实于原文,又带有主观的创造性。从中可以探寻出薛绍徽女性意识中的“矛盾”;她积极接纳西方知识,但也用儒家道德体系来抵制这些理论;她支持女学,但又恪守妇道。译者“保守与开放”态度并存,既认可自己的附属身份,又渴望新鲜事物,但这一层面的矛盾双方并不对立,而是呼应了当时社会“新女性”的标准。研究薛绍徽的《八十日环游记》,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女性意识主体,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新旧社会思想冲击下薛的处理方式和翻译方式。

### 2.2 陈鸿璧: 严守中立的译者

陈鸿璧(1884—1966),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在近代女翻译家中,她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位了<sup>[4]</sup>,她主办报纸,参与革命,积极投身教育事业。陈鸿璧从1906年至1912年间共发表11种翻译小说,1913年之后,陈鸿璧不再翻译文学作品,转而投身教育事业,翻译的选材也转向教育类作品。她用浅显易懂的文言文作为目的语,不仅语言简单凝练、流畅优美,较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艺术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她的译文注重

环境描写; 其次陈鸿璧擅长心理描写; 且她翻译文本的结构艺术与中国古典小说有异。

在清末, 直译往往跟“佶屈聱牙”“味同嚼蜡”“莫名其妙”等评价联系在一起<sup>[8]</sup>。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尽量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 并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改编和删节, 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从而进一步促进翻译作品的通俗化和本土化<sup>[5]</sup>。在意译广受欢迎、译者随意删减和增添原文或者添加译者评论的语境中, 陈鸿璧选择直译策略, 并能获得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可, 显现出译者独立于主流翻译策略的见识和卓越的翻译才能<sup>[8]</sup>。

### 3 翻译策略与社会性别观念的互动

#### 3.1 翻译中的性别视角重构

女性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题材时, 往往有意选择特定文本, 并在译语中保留或强化原文中的女性意识。例如吕碧城会特意保留“自我教育”“独立人格”等术语, 凸显女性解放思想。她们的译本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再造。

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语言表达方式, 重构了性别视角。她们不仅翻译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 更通过翻译, 将这些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相结合, 为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思想支持。她们的翻译实践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 更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

#### 3.2 语言策略的选择与身份的建构

部分女性译者采用“女性化”语言风格, 如温婉、含蓄、诗意的表达, 以符合当时社会对“女德”的期望, 从而争取发表空间; 而另一些女性译者, 如陈衡哲, 则采用批判性语言, 挑战传统规范, 塑造作为“新女性”的身份。这种策略选择既反映了译者的自我意识, 也体现了她们在男性主导话语中的应对机制。

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 建构了不同的身份。一些女性译者采用“女性化”语言风格, 以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 从而争取发表空间; 而另一些女性译者则采用批判性语言, 挑战传统规范, 塑造作为“新女性”的身份。这种策略选择不仅反映了译者的自我意识, 也体现了她们在男性主导话语中的应对机制。

#### 3.3 译者署名与“显形”抗争

在翻译实践中, 一些女性译者开始主动署名, 如苏雪林、谢冰莹, 表明女性文化参与者身份。这种“显形”的署名行为是一种政治姿态, 也是一种社会性别意义上的“抵抗书写”, 旨在打破男性主导的文化再现结构。

女性译者通过主动署名, 表明了自己的文化参与者身份。这种“显形”行为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 更是一种社会性别意义上的“抵抗书写”。她们通过署名, 打破了男性主导的文化再现结构, 为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 激励更多女性参与到翻译和思想传播的活动中。

### 4 翻译实践的社会影响与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

#### 4.1 激发女性社会参与意识

通过翻译, 女性译者将西方关于妇女解放、教育权利、婚姻平等观念引入中国, 引发广泛社会讨论, 对推动女权运动、改革旧婚姻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翻译成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和实践平台。女性译者的翻译实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们通过翻译, 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引入中国, 为中国女性的觉醒和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她们的翻译实践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更推动了女权运动和婚姻制度改革。翻译成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和实践平台, 为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4.2 塑造新女性形象

女性译者不仅传播新思想, 也在译文中构建了“独立”“理性”“有知识”的新女性形象, 这对启发女性自我认知、推动自我教育有重要影响。通过翻译, 她们在公共话语场中获得可见性, 成为现代女性形象的缔造者之一。

女性译者通过翻译, 构建了“独立”“理性”“有知识”的新女性形象。她们的翻译实践不仅传播了新思想, 更启发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通过翻译, 她们在公共话语场中获得可见性, 成为中国现代女性形象的缔造者之一。她们的翻译实践为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和文化基础。

#### 4.3 重塑中国翻译史的性别维度

女性译者的翻译实践揭示了翻译史书写中的性别偏见。重读她们的译作, 有助于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学术叙述框架, 推动翻译史的性别重构与多元呈现。她们的翻译实践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 更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她们的翻译实践为中国翻译史的性别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 5 结语

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译者, 虽然在主流叙述中常被“隐身”, 但她们的翻译实践却在文化转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翻译小说, 中国文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思想, 更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融入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 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

貌<sup>[1]</sup>。她们在翻译中注入性别意识, 既传播外来思想, 也借语言之力塑造自身身份, 实现从“隐身”到“显形”的转变。透过她们的译介与书写, 我们得以窥见女性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独特贡献。未来的翻译史研究, 应继续关注被边缘化的译者群体, 完善对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性别性与历史性的综合理解。

### 参考文献

- [1] 陈严春. 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国家意识及路径探微[J]. 上海翻译, 2023(2): 67-72.
- [2] 郭延礼. 女性在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翻译成就[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0(3): 38-50.
- [3] 郭延礼, 郭蓁. 中国第一位女性翻译文学家: 薛绍徽[J]. 东方翻译, 2009(2): 37-40.
- [4] 郭延礼, 郭蓁. 近代著名的女翻译家陈鸿璧[J]. 东方翻译, 2009(1): 60-62.
- [5]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4-5.
- [6] 康有为. “翻译文学与佛典”,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1984: 67.
- [7] 刘立. 民国女性翻译家张近芬的译者行为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4): 138-148.
- [8] 罗列, 穆雷. 论五四前中国女性译者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策略[J]. 外国语文, 2013(6): 117-122.
- [9] 夏维红. 失语的女性译者——基于近代女权话语对清末民初女性译者群体的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2): 149-157.
- [10] 中村忠行. 清末侦探小说史稿[J]. 清末小说研究(日本), 1980(4): 1-14.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